

# 廖中恺的反帝爱国思想述评

叶 芳 李蓉新

**【摘要】**廖中恺的一生和主要革命活动中，都贯穿一条线索，那就是他的反帝爱国思想。在理论上，他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力图克服资本主义弊病。他的探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上探索“单税社会主义”学说；二是从政治上探索“直接民权”思想，这构成了他独特的带有救国性质的政治经济思想体系。廖中恺还积极地将理论探索付诸实践。他主要通过投身革命活动、与孙中山一道施行“平均地权”、支持群众反帝运动、促成国共合作等方面实践其反帝爱国思想。

**【关键词】**廖中恺；反帝爱国思想；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K201；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 (2007) 01—133—05

廖中恺是国内外知名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和革命活动都贯穿着反帝爱国的思想。这主要包括在理论上的探索和在实践上的贯彻两个方面。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探寻廖中恺的反帝爱国思想。

## 一、探索社会主义，力克资本主义弊端

如果阅读廖中恺一生主要的理论探索，我们不难发现，他一直都致力于寻找一条适合中国，而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社会主义道路，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 1、提倡“单税社会主义”

1905年，廖中恺以“屠富”为笔名，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11月份出版的第1号上发了一篇译文，即美国人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一书的“序言”和书中一节<sup>①</sup>。此书的理论被称为“单税社会主义”学说，这样，廖中恺也就被认为是这一学说的服膺者了<sup>②</sup>。孙中山说过：

《民报》要“革新学说”，“灌输人心而化为常识”。<sup>(1)</sup>廖中恺在第一号上即发表此文，可见当时孙、廖二人对这一学说的兴趣。而且，廖仅发表了这篇文章中的“序言”和“问题”两节，显然其针对性很强。因为这两节内容，主要指出了土地私有的弊端，并提出了如何救贫的方法，如主张土地国有，征收地价税归公共所有，废除一切其他税收，使社会财富趋于平均等。这些思想主张的译介，实际上表明廖中恺非常赞成孙中山反对大封建土地占有制、“平均地权”的革命主张。廖中恺除了宣传亨利·乔治的思想主张外，他还明显带有消除剥削，消除土地、财产不均的思想倾向。何香凝在回忆中说道：“他们在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时候，把资产阶级译作‘豪富’，把无产阶级译作‘细民’。”“仲恺在《民报》上用的笔名，叫做屠富。”<sup>(2)</sup>即含消除剥削之意。

其后，他在《〈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序》一文中很明

① 此书的基本论点是：随着社会进步发生贫困，贫困的症结在于土地私有制，故主张土地国有，单征地价税归公，废除其他一切租税。这即可使社会财富趋向平均，实现“协作联合”的社会，贫困问题就解决了。

② 廖中恺的这一思想和活动的形成或与孙中山有莫大关联。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当中有“平均地权”这一条，它长期被看作是孙试图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一个重要举措，而这一思想的来源大概也与亨利·乔治的学说有些关系。在形成“平均地权”思想以前，孙曾亲到美国目睹耳闻过亨氏学说在美国的发展情况。1899年6月，他与章太炎的初次交谈中曾说：他“对欧美之经济学说，最服膺美人亨利·佐治之单税论”。参见章炳麟：《馥书》，1906年修订版。1902年春，他们第二次交谈时，孙中山又指出了要按人口分地来设计“均田法”方案。参见《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卷，第213页注释①，1093年12月17日，孙也许是第一次提到社会主义时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此为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近来欧美已有试行之者，然彼国势已积重难返，其地主之权与国家相埒……欧美今日之不公平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此固仁者所不忍出也。故弟欲于革命时一齐做起，吾誓词中已列为四大事之一。”同样参见《孙中山全集》，第228页。

**【收稿日期】**2006—07—19

**【作者简介】**叶芳，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助教。广东广州 510225

李蓉新，四川师范大学助教。四川成都 610031

确地表示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经过许多变迁，因利乘便发达下来的东西。他的要点，是依赖资本家发展他的私人经济，借他荫庇以求造福于社会，在这种主义之下，资本家就是社会的中心，一切生产尽靠他来把持，激励国家行政，不过从消极那方面排除些障碍罢了。社会既靠着资本家，往往一个资本家破产，就牵动到数万人数千人失业，反要求国家社会来救济。所以法律、政治、经济种种之制度，多半为拥护资本阶级而设，使他日益发达。资本家之地位，既是如此，那么，百凡生产所赢余之利益，自然都趋归这一阶级手上。因为资本家之生产，是为自己利益而生产的，至于耗费者那方面之利害如何，他却不顾。所以欧洲自机器发明，产业革命以后，有生产越多、贫民愈众这种怪象，就是国家社会的病症，资本制度的破绽。政府为补偏救弊起见，就拿一种所谓社会政策，来调剂盈虚，调节贫富。但社会政策所能够收效的，究属有限，而社会之偏枯，阶级之争斗，到底是免不了的。政治组织之经济的基础，那就是从根本上摇动起来，非至崩坏不止。”<sup>[3]</sup>在这里，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分析，明确指出了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资本主义制度“崩坏”是必然的，阶级斗争是避免不了的。他还指出：“欧美各国，……在产业私有制度之下，资本主义绝流而渔，操母财而营商贾者，利乎人群生活之需，因钱币以购劳动，缘供给以肆征求，剩余价值之所归，威趋于一。而嗷嗷待哺之众，乃与牛马牺牲同其命运。于是愤懑不平之气，酿成阶级之斗争，经济革命、社会改造之声，嚣然噪于天下矣。”<sup>[4]</sup>此时，廖仲恺对资本主义的弊端已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力图寻找一条能够克服其弊病的道路。

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中国在这时代，自己经济的基础这样薄弱，而所受国际经济的压迫这样深重，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一社会主义的国家，依科学的组织用集合的方法，解决生产问题不可。生产问题解决，其他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是我所希望于研究社会主义一般之青年。”而社会主义“他的要点是以社会全体动员，来做福于社会全体的。所以在这种主义之下生产，是社会全体生产的，是为消费而生产越多，社会全体之享受越多。人人有平等之机会，社会无偏枯之病。”<sup>[5]</sup>廖仲恺所设想的未来的社会主义是公有制的社会，不存在政治上专制、阶级剥削、贫富两极分化、少数富人专权等不平等与不合理的现象，而他认为，单税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

## 2、提倡“直接民权”

除了经济，廖仲恺对社会政治也有他的理想。

在《虚无党小史》的译按中，他写到：“此节似非专论俄罗斯事者，杂感旁午，如悬旌然，每多提笔而案语即奔集者……。”在此篇中，译者果然按语不断，译到俄罗斯司法制度时，他说：“虽然，较之以就地正法者则何如？”接下来一段说到俄罗斯对待辩护士之专制，他又说：“然较之禁出入公门拿办讼棍者何如？”<sup>[6]</sup>他其实是在思考中国的民权问题。

其实，在《〈全民政治论〉译序》一文中，作者对自己的政治基本主张有比较系统的阐述。文章一开始，作者即指出“此书别名为《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于民政之作用》，其实这就是廖的“直接民权”思想的内容。<sup>[7]</sup>在武昌革命八周年纪念日时，他说民国比如一个普通人，从孕育到诞生到成长，“一切卫生条件，营养的要素，都是欠缺的了不得。并且中间经过两回绝命，和许多小儿科里很危险的病症，加以传染病的包围，却居然能活到八岁。”<sup>[8]</sup>他谈到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但这两个目的，还是空的，他认为“求其根本原因，记者以为在于权力为中心，傍落散失而不能聚。私人党派间之窃得一份者，各因其势，互为牵制，互相抵消，于是转机无或得动。夫中华民国主权在民，一切政治应由此发，亦由此受，是则既失之权力中心，应有所归。所需者，唯四万万之失主，自去追赃耳。”<sup>[9]</sup>他觉得，现在这种情形，“若不早点拿个决心，恐怕这中华民国的空格子，就要给四周压迫的空气压塌了！”<sup>[10]</sup>

通过研究，他认为现在欧美等国代议制的“两院制不过是在民权发达的路子上一个过渡的东西，不能一本书念到老的”，它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sup>[11]</sup>廖仲恺对美国威尔科克斯所著《全民的政府》一书中倡导的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事的三大民权主张十分欣赏与有兴趣。他在译介该书的序文中说到：“现在美洲、欧洲、澳洲有些地方的人民，享有三个大大的民权”，“我们译他第一个叫做‘创制权’，第二个‘复决权’，第三个‘罢官权’”。<sup>[12]</sup>较为完满的民权主义，应该是实行“国民全体决议制”——即让“国民全体投票直接参政的制度”，使不完全的间接民权发展为较为完全的直接民权，将政党和少数人操纵的政治，转变为国民参政的“全民政治”。具体来说，就是让人民享有“创制”、“复决”、“革官”三大政治权利<sup>①</sup>。他还认为真正的民权单靠普通选举和宪法的保障是不能充分达到的，因

① 参见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35 页。他还解释说：“创制权者，人民于一种限制之下，有提出请求书，要求公众投票，决定一种政事之兴废，或强迫国会通过法案之权也；复决权者，人民有受政府机关采访七意，而以投票决定理发机关所通过某种法案之权也；罢官权者，人民于一种限制之下，有提出请求书，要求公众投票，决定所选举官吏应否罢免之权也。综此三者言之，或亦曰直接民权。”他认为，此种制度，是“政治上之防腐剂”。参见《双清文集》上卷，第 135—136 页。

为立法权不在人民手中,就会使这些都成为形式和工具,但为了统一政治意见,代议制无法丢弃,所以“不能不采用‘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这三件物事的内容和作用。”而这当中,廖着力强调立法权,一定要赋予人民立法权,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权主义,而且,他说:“我们的民权主义,就是要走到这步为最小的限度。”<sup>[13]</sup>

由此可见,“单税社会主义”和“直接民权”的思想是廖仲恺的重要理论探索成果,它们也是廖的社会政治理想,这个理想的出发点是爱国、目的是救国。这两点又是基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深刻反思而演发出来的。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廖仲恺的研究不止这些,比如说他认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资源掠夺,必须要首先废除不平等的条约,才能求得产业发展等等。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是有较为认真的思考和认识的,也表明廖仲恺的社会政治理想是稳定的,不是一时的思想冲动。

## 二、投身革命活动,实践反帝爱国思想

廖仲恺崇尚实干,他不把自己关在书斋里,而是积极地将理论探索付诸实践活动,这更加体现了他爱国情操的可贵之处。总体来说,廖仲恺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投身革命活动

廖仲恺生于一个美国华侨家庭。19世纪的后期,美国反华情绪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廖仲恺寄居加州,受了父亲廖竹宾影响,从小就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观念。他目击美国警察贬损中国侨胞为“黄狗”<sup>[14]</sup>,更身受异国同学的凌辱。种族歧视的不平等待遇,激发了他爱国的热诚,使他感到“富国强兵”的必要。他日后投身革命运动,主要还是基于这种爱国心理。廖竹宾还鼓励他的儿女学习中国的文字。他说:“要爱护祖国,第一条件,就是不要忘记祖国的文字。”<sup>[15]</sup>他又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对于祖国的文字更应该学习精通。”<sup>[16]</sup>当廖仲恺受到美国孩子欺侮的时候,他的父亲感到十分痛心。他深叹清政府积弱,不能保护寄居外国的侨胞。他希望廖仲恺有机会为祖国服务,帮助中国达到富强的地步。<sup>[17]</sup>廖仲恺的叔父廖维杰,精通洋务。他的亲兄恩焘,从事外交工作。两人的共通目标是为中国自强而努力。廖竹宾希望廖仲恺返国,担负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就这样,在经意和不经意间,廖仲恺已经建立起他独特的反帝爱国思想了,这也可说是他参加革命的最初推动力。

1902年,廖仲恺对何香凝说:“国家危险至此,我们岂能坐视?日本留学界朝气蓬勃,志士云集,我也想东渡求学,结交革命贤豪,共图大业。”<sup>[18]</sup>这样,夫妇东渡日本求学,寻找救国之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留日学生是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发

起群体,孙中山十分注重在日本留学生中培育革命力量。在这样的环境中,廖仲恺夫妇深受影响,于1905年先后加入同盟会,满怀热情地投身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

从加入同盟会开始,廖仲恺就表现了他的特长,他的外文水平在会中是极突出的,所以,早期他主要在孙中山的影响下,翻译了大量西方社会主义流派的文章,从事革命宣传的工作。在他的介绍译介下,西方许多流派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学说流入中国。孙并派他从事革命联络工作。廖氏夫妇还主动担负起同盟会的资金筹措工作,支持同盟会在各地开展革命活动。为了发动起义,孙中山要派同志回香港活动,廖仲恺夫妇宁肯自己一家省吃俭用,也要尽一份力量,和大家一道“帮助筹措旅费”。何香凝娘家汇给他们的钱,除维持自己简朴的生活费用外,统统都花在革命斗争方面,此事还一直瞒着她的父母与兄弟姐妹。<sup>[19]</sup>他们还利用在海外华侨中亲戚朋友众多的有利条件,尽力为筹集起义经费出力,他们与朱执信等人联名“写信给海外美洲等地华侨,向他们宣传推翻清朝帝制的必要,深得海外华侨的同情。不久也有华侨加入同盟会,并寄了款来,赞助革命”<sup>[20]</sup>。孙中山对此很满意,他将“当时对革命活动的筹款事宜,多交由廖仲恺夫妇担任通讯和联系”<sup>[21]</sup>。

1914年,同盟会分裂,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廖仲恺加入。1915年,日本提出侵害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竟予以接受,国人大震,举国上下奋力排拒,形成了民族主义高涨的局势。由于种种原因,同盟会未与国内上下一至排外,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讨袁斗争上。廖仲恺作为中华革命党的一员,宣誓效忠孙中山,自是唯其马首是瞻。中华革命党的中心任务是推翻袁世凯的反动专制统治,有不惜牺牲民族利益的非常做法,这一点的确遭人诟病,但也正如杨天石先生所说的,问题有其复杂性,“我们当然不应该因此而否定孙中山在近代史上的崇高地位……”<sup>[22]</sup>。对廖仲恺亦是如此。

### 2、与孙中山一道施行“平均地权”

1912年,孙中山开始在广东实施其平均地权理念,廖仲恺是积极的支持者。有学者认为:廖仲恺实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积极实施“平均地权”社会革命纲领之第一人。<sup>[23]</sup>

在担任广东省财政司长后,廖仲恺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推行地价税契法案”。这一法案遵循“单税社会主义”原则,是实现“平均地权”革命纲领的途径之一。按照廖仲恺的想法,议定公平合理的征税制度,消除社会贫富不均的弊病,必须以换契为前提,最终达到土地国有,平均地权的理想。他说:“目前孙先生发起土地国有问题,亦宜先从租税着手;而欲整顿租税,又必以换契为前提。”<sup>[24]</sup>

廖仲恺的实践虽然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而中断,但作为

一种积极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实践尝试，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此后，廖仲恺的理论探索并未终止。1919年，他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革命继续的工夫》一文，他很睿智地分析了极差地租的产生，说明了地价的增值是社会共有的利益。文中还明显表露出他对苏俄社会主义的向往。他认为可以将苏俄的“把土地完全收归国有”视为解决土地问题和民生问题的榜样。他说：“俄国受这害比英国更深，农奴解放之后，不去解决土地问题，弄到这回革命，才把土地完全收归国有。”<sup>[25]</sup>他还认为中国交通不便，所以大地主不易发生，到交通改善后，就会有大地主产生。“社会经济发达的结果，以地界的名义，七八成归了地主，其他人民只享得二三成。国家拿人民的税来做公共的事业，做好了只便宜一阶级的人，是不公道的。”<sup>[26]</sup>所以，他认为，公共事业也应当归国有。这样，土地通行增价税，并归民国国家所有，这些款项则用以投资公共事业以回馈社会，于是土地问题就解决了。

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孙、廖二人力图克服资本主义弊病，实施社会主义理想是极具诚意的。

### 3、支持群众反帝运动

廖仲恺通过研究和分析，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有深刻的洞悉。他认为任何帝国主义都不可依靠，“若止靠他人做便饭，是要饿死的。”<sup>[27]</sup>“军阀可以作恶性横行，他们背后就靠列强帝国主义者来扶持。军阀是一傀儡，列强帝国主义者在后拉线。”“帝国主义一出，全世界弱小民族与国家，无不被其侵略。不独小手工业尽被摧残，农业受害尤烈，不独澳、菲、印等地方尽被压迫，我国数千年之安定生活，及以农为本之国情亦随之根本摇动了。”他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经济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因而，坚决主张打倒帝国主义。他说：“中国不乱，外国无利益。这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之明证，故要将帝国主义打破”；“我们想得到丰衣足食，又不被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压迫，又一定要明了主义，一致去打倒军阀，一致去打倒列强、帝国主义”；吾人其不欲解决吾人之痛苦及谋国家人民之丰富则已，否则必须与帝国主义者战！”<sup>[28]</sup>

五四运动后，他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更加有了深刻的感受，对“直接民权”理想有了更加坚定的态度，他说：“从前没有这物事，是不晓得；这回晓得也是和随便的试一试。却这一试真厉害，北京根深蒂固的几个大官也就罢免了，政府对于欧洲和会的约也不敢签了。政治上叫做民权，就是这个骨子；外国叫做直接民权，就是这个化身。”<sup>[29]</sup>他又在《国民的努力》和《中国和世界》两篇文章中一再要求中国人政治上觉醒，经济上追赶世界先进，不要固步自封，

只知贪图眼前蝇头小利。可见他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寄予厚望的。

1924年7月，广州发生工人反对英、法帝国主义无理要求的“沙面大罢工”，国民党中央及广东省政府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援助罢工，廖仲恺在期间旗帜鲜明地支持工人运动。接着，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中国反帝热潮再度掀起。1925年6月19日，香港工人响应反帝热潮，宣布罢工。省港大罢工开始后，廖仲恺“以工人部名义，封闭全市的赌馆、烟馆、公产、敌产，作为罢工工人的宿舍；以财政部名义，每日发给罢工委员会1万元为经费，并于7月份在广州征集捐租半月（后改一月），在各县征收股实绅富捐，拍卖所有没收英帝货物，用于支持罢工工人。”<sup>[30]</sup>廖仲恺还热情洋溢地发表演讲：“这次罢工的目的是为国家谋自由与独立，争国家的地位和争取民族的人格。”<sup>[31]</sup>是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是“中华民族最大的事”，“如果能够成功，不只是工人和商人某一部分的胜利，而是全民族的胜利！”<sup>[32]</sup>他并且帮助罢工委员会实施“特许证”策略，只对英货实行封锁，孤立了英帝国主义，从而巩固了罢工的成果。

廖仲恺对英帝国主义的反抗，也许最终造成了他在1925年8月20日的遇刺身亡<sup>①</sup>，但他的反帝爱国思想却永远长存于人间。

### 4、促成国共合作

大革命时期，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和制度契合了廖仲恺的反帝爱国思想，这直接促成了廖仲恺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国共合作。

廖仲恺认为俄国和俄共是打倒帝国主义，为全世界人民谋共同福利的典范。在《广州中国国民党追悼列宁大会的演说》中他说：“今天追悼列宁先生。列宁先生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实行革命家。”“他（指列宁）所做都是为被压迫民族奋斗，为无产阶级而奋斗。”<sup>[33]</sup>这期间，他更多地接触和研究了苏俄的社会政治，表现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赞赏，并决定以俄为师：“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sup>[34]</sup>1925年1月在主持纪念李卜克内西逝世六周年、列宁逝世一周年大会上，他演说道：“李、列等是为世界人类打大不平，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即此一点，已足为吾人纪念之价值。”<sup>[35]</sup>

在孙中山的授意下，廖仲恺于1923年2月至3月与越飞举行了会谈，汪精卫说：通过一个月的接触和“互相辩论，把各种问题统统研究过了”，“此时东方人未知道的许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详。如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

① 关于廖案的研究参见：陶季邑《廖案之谜》，《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3期，113—117页；陈华新、丁旭光《廖仲恺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228页；周兴梁《廖仲恺和何香凝》，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文。虽然此案仍有争议，但基本结论中，英帝都无法脱开干系。

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与俄国何以想和中国携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所以，廖仲恺回国后“做联俄的工作。当时许多同志怀疑，但廖同志却很勇敢、很坚决去干。”<sup>[36]</sup>

1923 年夏季开始，廖仲恺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势力，渐渐居于胡汉民和汪精卫之上。他虽然仍然宣传三民主义，但他的思想实际已超越了三民主义的藩篱。他宣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对内要打倒官僚军阀及一切反动力量，对外要抵抗帝国主义者的重重压迫。”他痛斥帝国主义者“破坏我国国民经济之建设，使我国永沦为半殖民地。”<sup>[37]</sup>由此可见，他心中的国民革命是一个“为国家谋自由与独立，争国家的地位，和争民族的人格”<sup>[38]</sup>的政治革命。正由于此，他热情地支持国共合作，支持全民族共同努力抗御外敌。

综上所述，廖仲恺用他一生的智慧和能力去践履他的救国理想。廖仲恺最大的优点在于有理想而不是空想，有

理论而不囿于理论，既是思想者又是实践者。所以虽然他的人生过于短暂，但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理论上，他积极探索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而且还寻找到“单税社会主义”和“直接民权”等一些具体成果；在实践上，他更是得到同时代的人的普遍认同。张国焘在回忆中说：“我们谈廖仲恺，他（指鲍罗廷）叹息着说：‘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他还指出廖愿多做些实际工作，却不愿居领导地位。”<sup>[39]</sup>

廖仲恺将反帝和爱国有机结合起来，并贯穿于他的人生追求之中，使他的生命体现出一种鲜明的特征。

除此之外，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的爱国德操也是令人钦佩的。他们均出身殷实家庭，然而却放弃舒适的生活，毅然投身革命狂潮之中。无私爱国，不尚空谈、不计名利，廖仲恺的爱国情操是值得被铭记的。

#### 【参考文献】

- [1] 孙中山. 发刊词 [N]. 民报, 第 1 号. 转引自周兴梁. 廖仲恺和何香凝 [M].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31.
- [2] 尚明轩, 余炎光编. 双清文集: 下卷 [M]. 人民出版社, 1985. 913-914.
- [3] [4] [5] [6] [7] [8] [9] [10] [11] [13] [25] [26] [27] [28] [33] [34] [37] [38] 尚明轩, 余炎光编. 双清文集: 上卷 [M]. 人民出版社, 1985. 740-741, 927, 741, 28, 45, 46, 135, 320, 142-143, 323, 334, 325, 328, 328, 609-610, 628, 699, 609, 628, 703, 609, 610, 931, 757, 759, 862, 325.
- [12] 三大民权 [A]. 廖仲恺集 (增订本) [M]. 中华书局, 1983. 12.
- [14] 廖梦醒. 我的母亲何香凝 [Z]. 人民出版社, 1984. 3.
- [15] [16] [17] [美] 陈福霖. 孙中山廖仲恺与中国革命 [M].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0. 174, 174, 175.
- [18] 邹鲁. 中国国民党史稿: 第 4 篇 [M]. 上海书店, 1587. 1587.
- [19] [20] 何香凝. 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 [Z].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 11, 9.
- [21] 龙裔禧, 等. 廖仲恺事迹记述 [A].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 [C]. 164.
- [22] 杨天石. 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 [A]. 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288.
- [23] 周兴梁. 廖仲恺和何香凝 [M].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52.
- [24] 粤中换契问题 [N]. 民立报 (上海) (1912 年 6 月 20 日). 转引自周兴梁. 廖仲恺和何香凝 [M].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55.
- [29] 三大民权 [A]. 廖仲恺集 (增订本) [M]. 中华书局, 1983. 11-12.
- [30] 罗大明, 等. 大革命时期广东工运情况的回忆 [A]. 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 [Z].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346.
- [31] 在省港大罢工工人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A]. 双清文集: 上卷 [M]. 人民出版社, 1985. 862.
- [32] 在省港罢工委员会招待各界会上的演说 [A]. 双清文集: 上卷 [M]. 人民出版社, 1985. 906.
- [35] 建国粤军月刊, 第 2 期 (1925 年 2 月). 转引自 [美] 陈福霖, 余炎光. 廖仲恺年谱 [Z].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1. 324.
- [36] 周兴梁. 廖仲恺和何香凝 [M].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142.
- [39] 张国焘. 我的回忆: 第二册 [Z]. 现代史料编辑社, 1980. 58.